

書評

社會變遷與教派宗教在現代社會 的文化合理性

評陳進國，《救劫—當代濟度宗教的田野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范麗珠*

《救劫—當代濟度宗教的田野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陳進國博士的新著，展卷長讀，甚是欣慰。本書凝聚了作者多年田野觀察的心血，主要關注於以「濟度宗教」為特徵的民間教派宗教；對民間教派宗教的研究沒有局限於中國大陸，而是涵蓋了作者對東南沿海、港臺以及東南亞地區長期田野調查的內容；從過去一個多世紀現代化引發的政治格局與社會變遷的時間軸，敘述民間教派在不同時空中的命運，讓讀者得以從一個較為宏大的視野來認識中國民間傳統宗教信仰在新的社會情境中存續發展所具有的現代性意義，來探尋教派宗教存續與發展的文化合理性。

楊慶堃在其著作中指出了中國社會存在著制度性宗教和彌漫性宗教這兩種重要形式，在許多情況下，制度性宗教和彌漫性宗教相互依賴、互為表裡。儘管民間教派發展了自己的神學觀、儀式和獨立於世俗社會制度的功能和結構的組織體系，同時也因為能夠與世俗制度產生積極互動而得以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存續和發展。¹ 歐大年教授在其對民間教派的研究中也指出，民間教派團體在中國宗教史上的地位及其與社會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² 而進入現代化時期，民間教派運動一方面受到貶低與政治性的打擊，另一方面學術研究對此議題也鮮有關注，更缺乏從社會發展演變、特別是中國宗教整體的角度來認識。

近年來已經有大量的關於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然而卻鮮見對依然活躍著的教派宗教之研究。陳進國博士這部新著以卓越的學術勇氣，揭示了在現代化語境中始終被邊緣化的民間教派在華人社會中的生存狀況，不僅證實了民間宗教以其救世的特徵尋求聖脈延續和創造性發展的實踐，同時也在理論上將民間宗教的討論統合了組織形態的「道門」、「教門」以及彌漫在民眾生活世界中的「道統」、「教化」等信仰。

首先，透過對民間教派宗教研究史的探討，本書指出目前中國宗教理論性研究所遇到的問題和困境。在現代化格局中，和其他傳統宗教信仰的命運相同，民間教派宗教一直無法擺脫其文化「異端」的處境，本書鮮明地提出這種處境是西方價值文化殖民化「話語共謀」的後果，學術研究應該將中國道（教）門或民間教派回歸到「正常化」的中國宗教傳統譜系之中，此涉及對於中國文化內在圖式或文化秩序觀念的自我反思，其目標更在於建立中國宗教研究的理論體系。

作者對中國民間教派傳統非常稔熟，他不拘泥於歷史文獻，借助扎實的田野研究、以活生生的案例，來認識傳統宗教在現代生活中的存續。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民間教派作為整體性的「家族」—道門、教門，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危機與社會變遷，恰恰是本書所要揭示的教派「濟世」的特點，賦予其在不同地域與政治文化條件下存在和發展的可能。作者注意到了，在前所未有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變遷中，民間教派屢遭跌宕，卻仍能順應變遷，為世俗化時代華人群體應對現代性的挑戰提出解決的方案。鑒

¹ 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2章。

² 歐大年，《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2。

於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文化危機，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認為「現代主義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並提出一個與現代世俗主義相背的答案：重新向著某種宗教觀念回歸，因為現代社會的種種文化困境和問題源自於現代主義存在的信仰危機。³ 同樣遭遇源於發展變遷、政治多元化，以及文化殖民主義侵害造成的道德困境的華人社會，其道德重建所仰賴的文化資本，離不開滲透於日常生活世界的宗教信仰與實踐，而民間教派所具有的組織與系統性特質往往使之有機會獲得對民眾的影響力，成為新興宗教運動因應時代問題進行創新發展的重要基礎。本書所詳述的不同案例，基本上具有一個相同的特質，即通過宗教教派組織在儀式、信仰以及組織等形式，喚起參與者道德上的覺醒，並將傳統教化結合現代社會參與來豐富民眾的宗教修行生活以實現個人的救贖，並進而成為改造民間社會和道德生活狀態的力量。

教派宗教因其異端的標籤，在傳統時代往往處於隱秘狀態，又從而被現代學術研究所忽視。楊慶堃先生觀察到，儘管「現代民間教派運動的具體情況雖然鮮為人知，但在普通民眾來說卻非常重要。在普通民眾中，教派主義神學的影響是有效的，因為它以民眾所熟悉的宗教前提為基礎，即神靈的超自然力量和能給凡人帶來福祉的神話故事。」⁴ 在本書中，作者進一步地向人們揭示了教派宗教得以發展的另一個因素，那就是社會結構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過程中，在熟人社會中彌漫性宗教需要獲得現代社團組織的身份以便確立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教派團體與生俱來的民間性使其能夠通過傳統的信仰、儀式以及民眾所熟悉之具有克裡斯馬特質的宗教領袖聚合起來，同時既有的組織形式更適合現代社會中兼具文化合法性和社團身份的合法性。本書所研究的案例多數都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獲得了社團合法身份，從而使得教派信仰的神道設教宗教運動延續著濟世度人

³ Daniel Bell, 趙一凡等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三聯出版社,1989年,第40頁。

⁴ 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3章。

的精神傳統。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本書中所述的案例基本上反映了在過去一個世紀民間教派跌宕坎坷於民間興滅繼絕的經歷，同時也體現了在全球資本主義和文化殖民力量的衝擊下，主流話語對東方文化傳統的「疏離與叛逆」，在不經意間給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深重的文化傷害。而本書所述的民間教派在各地的實踐，無形中扮演著存續中華文明信仰精神的角色，被作者視為文化保守主義。這種不具侵略性，更多地表現為在強勢外力下的自我保護，通過承續文化精神傳統、以濟世度民的宗教方式為民眾提供安身立命的途徑。書中以豐富的歷史和田野資料證明了，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嚴峻的「皇民化運動」來取代臺灣民眾中華文明認同，正是自覺興起的「儒教運動」（以善社、鸞堂為代表的「宗教性儒教」），積極宣講保存漢文化，通過宗教本土運動或濟度宗教運動來對抗日本的殖民主義。一貫道在東南亞的發展也是通過宗教結社運動，以延續中華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生活文化）。面對其他族群借政治力量削弱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與信仰的各種壓力，一貫道扶乩與宣講儒學之方式不但契合民間鸞堂儀式形態，從而也在華人社群中建構起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信仰組織。

當代組織性教派宗教與「文化性原教旨主義」相結合，由於貼近民眾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需求，能夠採用恰當的方式來解決民間各種各樣的焦慮（精神和肉體）。香港金蘭觀作為「濟度道教」，以傳統扶乩的方式與信眾溝通，借助贈醫施藥、靜坐氣功、修真課程等修行實踐，承傳的正是中國「神道設教」的文明傳統。閩東二縣儒教道壇更以民間教派神啟權威的影響力，在幫助個人身體上的救贖以及道德上覺悟的同時，將儒教教化以及神秘信仰灌輸到民眾的宗教修行生活，成為改造民間社會和道德生活狀態的力量。

如今的教派宗教在現代化的歷程中已經過了相當時間的調整，比如臺灣一貫道擺脫神秘外衣，成為透明的社會團體，閩東的儒教道壇則盡力祛除巫醫的色彩。值得觀察的是，教派宗教往往強調其對傳統文化傳承的使命與責任，並在日常修行確實地將民間儒教經典、混合信仰的善書以及濟

世渡民的理念結合起來。特別是在政治儒學、意識形態儒學失去正統地位之時，民間教派一方面擁有因應時代問題進行創新發展的道德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引有著多元信仰傳統的民眾。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教授曾講過這樣一段話：在追尋亞洲現代性的「精神」時，另一重要的研究領域是民俗宗教。⁵ 從臺灣的新興宗教現象可以看到傳統宗教觀念與象徵符號在社會急速發展之際獲得了新的表達機會，比如儒宗神教的流行在此過程中表現得特別引人注目，其宗教態度大致以「講道德而明禮讓，解經書而終人倫，雍和上下而別尊卑，談說因果而敬鬼神」的社會教化宣講為主。⁶ 原本在大陸和臺灣都飽受詬病的民間教派團體——一貫道，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實行解嚴以來，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並借助兩岸頻繁的互動往來，重返大陸；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打起儒教旗號的一貫道從臺灣流傳到東南亞後，更已經傳播到幾十個國家。在擺脫令人起疑的神秘色彩的同時，一貫道強調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特別更以儒教的傳承為重任。其對天道的理解，借鑒了中國文化傳統裡豐富且多姿的宇宙意識，繼承了中國人心靈旁通統貫的管理智慧。一貫道的核心思想就是扣緊在具有宗教性的宇宙意識上，儘管其中雜糅多種宗教因素，卻明確地以「儒教」而自居。本書有大量的篇幅和詳實的資料解說了一貫道在東南亞國家發展的情況，令人耳目一新。

根據作者的研究，以中國傳統信仰、儒家價值以及三教合一理念為基本內容的民間教派實際上反映了民間對於「醒世」、「救世」、「治世」，以及現世修行的迫切，透過簡潔易行的神啟方式，將傳統上儒家大傳統宣導的道德教化，以借助扶鸞、法門和靈性的嚮導來達成。在早期主流社會的儒教制度性平臺坍塌之後，原有正統儒家的「異端/正統」、「正祀/淫祀」、「邪教/聖（正）教」、「邪經/聖（正）經」之辨日趨於模糊，教派宗教於是有機會因應文化衝擊而形成「中體西用」的創教模式，將某些具有革命或解放

⁵ 參見李亦圓《宗教與神話論文集》，臺北：立緒，1997，頁200。

⁶ 鄭志明，《臺灣民間宗教結社》，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頁318。

色彩的政治想像與烏托邦願景（保國、保教、保種）放到其教派組織信仰中。而教派團體在當代的復興與發展，在作者看來更是一種文化自覺與信仰自覺的反應，卻無意於走向文化狹隘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此實在得益於教派宗教本身具有的多元一體的素質以及在多元化環境中獲得的發展機會。如，作者指出一貫道泰國取得成功的原因，一則是滿足了當地華人重新學習中華文化的需要，二則是其三教歸一的綜攝主義特性與當地主流的佛教信仰較少有排斥性。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始終不具有積極的傳教性，更由於三教合一的混合信仰觀念，因此能漸漸地發展成民眾的生活方式，與有著極強的組織體系和傳教特質的基督宗教大相庭徑。顯然，教派宗教的組織性結構超出了傳統民間宗教的鬆散狀態，具有了新型社會組織的樣貌，足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組織形態與管理模式，而其本身的多元混合信仰則避免了與其他族群宗教信仰產生嚴重衝突的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教派組織也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順應潮流，借鑒其他宗教的組織方式，如科層制管理、每週的宣道、集體的懺悔班、傳道的組織、公共慈善等，超越熟人圈子而吸引更多民眾。按照作者以「文化涵化」的角度觀察，此種宗教結社之「新」，常常是一種「生（外教的生機）」與「熟（三教的熟料）」混合的氣質，早熟而不成熟，也就是日常化的「信仰拼盤」。而具有中國特色的宇宙生成論和濟世救劫論，也是在全球化和外來文化刺激下而形成的宗教革新思想，與傳統的濟度宗教具有較大的差異，呈現了一種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特徵。

對當今世界在不斷世俗化的同時也出現了廣泛的宗教復興現象，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用「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來描繪。不難發現，在宗教復興的浪潮中，人們從各自傳統宗教中汲取養分來應對各種現實的挑戰。⁷ 在強調政教分離和宗教私人化的美國，美國社會學家發現在美國個人主義宗教價值源於《聖經》，「美國的宗教歷來就有第二性語系的

⁷ Robert N. Bellah, William M. Sullivan, Richard Madsen, Ann Swidler, Steven M. Tipton, *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Vintage, 1992, p. 286.

豐富寶藏，它包含在《聖經》之中和按照《聖經》原則產生的現實生活傳統裡。」⁸全球化時代促成了日益頻繁的跨文化交流，每個個體必然帶著特定文化的固有價值，而這些價值往往是受到有形和無形的宗教信仰的塑造，於是文化自覺的認知顯得越發的重要。作者在對教派宗教運動研究與分析中，毫不隱晦於西方文化霸權對本土文化帶來的衝擊與傷害，而復歸和承續傳統信仰的濟度性教派宗教運動無疑通過強調文化自覺意識與本土宗教傳統的自我革新，建構「信仰的區域網路」，使傳統文化得以堅守、傳統價值得以持續，並突破這百餘年來的「華人性的迷思」，教派宗教運動在各個不同地區的實踐與發展，在不同時空彼此呼應又彼此互證，成為全球宗教復興運動的現象之一。

(本文於 2018 年 7 月 20 日收稿，2018 年 9 月 30 日通過刊登)

⁸ 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Readings on the Themes of Habits of the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24.